顾野王《玉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

路 广 正

顾野王的《玉篇》是我国字书史上继《说文解字》之后的一部重要字书，也是用楷书传写的最早的字书。由于卷帙浩繁，传抄不便，到五代时就失传了，只有被来我国留学的日本僧人抄写回去并在东瀛广为流传的卷子本还保留下来一部分残卷。本世纪初，由黎庶昌、罗振玉等人先后用摹写、照像影印之法传回中国。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卷子本和《古逸丛书》本两种原本残卷。至于明清以后学者们经常在著作中引用的《玉篇》，乃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在唐人孙强的增字减注本基础上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与顾氏原本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通过对原本残卷的考察来研究顾书的性质、体例、价值，从而公正地评价它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对于中国字书史的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谈谈顾野王原本《玉篇》对于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我们从字数方面进行一番考察：

周秦之际，我国通用的文字大抵载于《史籀》、《苍颉》二书。《汉书·艺文志》说：

>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史籀》篇有9000字。汉代的《苍颉》篇由"闾里塾师"省并《苍颉》、《爰历》、《博学》诸篇而成，55章，3300字。汉武帝以后，司马相如、史游、李长、扬雄等人的著作陆续把收字数目增至6000多。到了许慎著《说文解字》，就收到9353文，还有1163个重文。此后，《声类》、《字林》递有增加，到顾野王著《玉篇》，比《说文解字》增加了6560多字。可见随着汉字字数的不断增多，历代字书收字数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玉篇》的增字同汉字字体的演变与佛学的输入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由小篆到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隶变之后，大量的异体字产生了。原本《玉篇》的"言"部，收字312个，40%以上的字都有异体。其中两个异体的如"警——儆"、"譞——儇"等共84组，三个异体的如"讴——呕——怄"等共26组，四个异体的如"侩——诠——话——舐"等共16组，还有五个异体的如"谳——唁——訒——這——潋"等，异体字真是多得惊人。这种现象，编字书的人当然不能不予以充分重视。另外，佛学的东渐，使写经形成风气。那些抄写经文的人往往并没有什么大学问，他们用楷书抄写的佛经卷子，掺杂了大量的"俗字"。这样，汉字的数目从东汉以后就激增起来。增加最多的，自然是社会上最常用的字。据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说，广益本《玉篇》的"舟"、"风"、"山"、"石"等部，比《说文》增字五六倍，"毛"、"皮"二部增字十一倍，"身"部则增至十一倍。这同时说明人们对自然、社会及人体自身的认识是更加细致深刻了。词语的增多，促使文字符号也跟着增多，有时是几倍、几十倍地猛增。当然，有些字上古时常用，后世可能不常用了，象"鼎"部的字，就绝少增加，而《玉篇》的"邑"部反比《说文解字》减少了9个字（这是举广益本《玉篇》的例子）。广益本《玉篇》比《说文解字》多出13208字，可是它并不能十分恰切地说明原本《玉篇》的收字情况。今天，想拿原本《玉篇》的残卷作全书字数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统计是困难的，因为它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六十几部，还不乏缺漏湮灭之处。据我的计算，《玉篇》残卷现存大字共2192个（周祖谟先生在《问学集》中说“大字二千一百三十余字”，疑有漏计者），注文75703字。用这个数目与《封氏闻见记》卷二所载的“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相比较，残卷字数仅当原书1／8。我们可以想见，顾野王原书卷帙是何等浩繁！这大约与南北朝的时尚有关，当时的人编书，动辄上百卷，用力是很勤的。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里说：

> 按野王所收之字，大抵本于《说文》。其出于《说文》之外者，多引《三苍》等书。于字异义同且两部或数部并收，知其网罗《苍》《雅》，在当时已为赅备。

可见在收字方面，《玉篇》对于《说文》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其次，我们再考察一下两书在分部立文方面的情形。

先看分部：

《文镜秘府论》的作者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公元804至806年曾来我国留学，他精于书法文字，所著《篆隶万象名义》，部次安排全同于原本《玉篇》。他见到的《玉篇》传本是很早的。我们拿《篆隶万象名义》跟广益本《玉篇》相对照，就会发现：除“△”部（徐利反）、“来”部、“皿”部、“大”部、“奢”部、“习”部、“凡”部、“非”部、“素”部、“丝”部、“比”部、“录”部等在顺序上小有不同之外，其他大部分部首的安排还是一致的。就是说，广益本《玉篇》基本上保持了原本分部的旧貌。那么，拿广益本《玉篇》的部目与《说文解字》部目相比较，就基本可以说明《玉篇》与《说文解字》在分部上的异同了。

考察的结果是：《玉篇》部目虽然也是“始一终亥”，可是中间各部次第却与《说文解字》有很大的差异。《说文解字》部首的排列基本是以形之相近为次的，这和它探讨字义由篆形入手有关。而《玉篇》的部首排列，却似乎是依据字义相比次，但又不很精密。清代学者段玉裁和钱大昕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参见段氏《说文解字注》和钱氏《十驾斋养新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玉篇》在体例上存在问题，它并没有完全遵照以字义相近为比次的原则。譬如把“丸”部放在“九”部与“十”部之间，而“二”部、“三”部又不和其他数字排在一起，这些都是自乱其例。二是当时的后起字实在太多。譬如“父”字，《说文解字》释义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所以收在“又”部。但是后来又出现了“爹”、“爸”、“爹”、“爷”等字，于是顾野王只好又添了一个“父”部。类似的现象多了，又加上隶变的原因，在部目的安排上也就难免乱了套。但《玉篇》把“人”、“儿”、“父”、“臣”、“男”、“民”、“夫”、“予”、“我”、“身”、“兄”、“弟”、“女”等部收在一卷之中，倒是可以看得出顾氏在这方面毕竟作过一些努力。《说文解字》我们有《说文系传》中的《部叙》一篇可据以考察它的部目安排，而《玉篇》，可就很难发现它的相贯之理了。

下面再看看各部内立文的次序问题：

《说文解字》各部之内的立文，是以义之相引为次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一”部“吏”字下的注文中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在《说文解字》“玉”部的末尾，他总结道：

> 按自“璚”已下皆玉名也。“瑮”者，用玉之等级也。“瑛”，玉光也。……“璽”，异类而同玉色者。“靈”，谓能用玉之巫也——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

至于《玉篇》，虽立文次第大体与《说文解字》相同，但也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因，不免显得凌乱。我考察了一个“山”部，大致情形如下：

《说文解字》“山”部共53文，重文4。（新附字12）《玉篇》“山”部共147文。其中次序与《说文解字》相同的有29，稍有参互而相去不远的有15。《说文解字》中的新附字，《玉篇》大都列于部末。在这些字的前面，有70多个字是《说文解字》中没收的。这70多个字的排列顺序就比较凌乱。

为什么在分部立文上《玉篇》没有象《说文解字》那样严格的体例呢？我想，除了顾野王在说字方面注重于字义的训诂而只把《说文解字》的说解作为“广征”的材料夹厕于其他经传引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字书之间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文字发生了隶变，要“据形系联”是困难到几乎不可能了。在梁陈时期，编写字书还不具备创立笔画检字方法的条件，因为汉字当时规范程度还较差，许多字的部件与笔顺难于统一，还不象后来明代《字汇》和《正字通》产生时那样水到渠成，所以，顾野王在分部立文方面既要忠于许氏，又不可能完全忠于许氏，处在矛盾与困惑之中，这种情形是可以想见的。不过他却创立了“异部同文”之例——即在每字的说解后面，都十分认真地指出它“或为某字，在某部”，“今或为某字，在某部”，甚至进一步指出“某某之某为某字，在某部”，这就大大地方便了读者，用心是很殷切的。下面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看：

譓，今为噫字，在口部也。

纂，《字书》亦缵字也。

悤，《说文》古文细字也。

謌，古文为哥字，在可部。

这种“异部同文”的条例，是顾野王编著《玉篇》时，根据当时由于汉字隶变而出现了大量异体字的实际情况和编写字典的实际需要而创造的。在《玉篇》体例上，这是个很明显而且很重要的特点，可惜后人在重修时都把异体给删掉了，这对于考察汉字隶变后字形分化的情形很不利。《篆隶万象名义》因为出现时代较早，倒是大都保留了下来，在这一点上，它比广益本《玉篇》有价值。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顾野王在每字的说解中首先注出该字的反切。这是在反切兴起之后，作者适应需要，利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注音方法而不拘于《说文解字》的直音、譬况的一种进步做法。

顾野王《玉篇》同《说文解字》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们的说解。

许慎解说文字，是从形、音、义三个方面结合进行的。《玉篇》在这方面有所继承，但它并不是主要运用“六书”原则去推求字的本义，而是大量从经传子史中摘引前人传注，兼采各种字书，同时用案语形式加以补充，看起来象是在搞“字义集解”，简直是在做训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看：

《说文解字》：“饗，乡人饮酒也。从食从乡，乡亦声。”

《玉篇》：“饗，穴掌反。《周礼》：‘上公饗礼九献，侯伯饗礼七献，子男饗礼五献。’郑玄曰：‘饗，设盛礼以饭宾也。’野王案：《毛诗》‘钟鼓既设，一朝饗之’是也。《公羊传》：‘饗齐侯于祀丘。’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饭羹曰饗。’《仪礼》：‘机奠祝饗。’郑玄曰：‘劝强之也。’神明歆饗亦为享字，在辛部。”

《说文解字》以“六书”原则分析“饗”字，认为它是“食”和“乡”的会意，“乡”又兼表声音，是会意兼声字，由此得出“乡人饮酒”的解释，是这个字的本义。而《玉篇》则根本不谈它的本义，只是把古人传注中“随文释义”的话摘录在一起，告诉人们，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饗”字有着种种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的意义，这就很有点后世字典雏形的样子，只是它还没有进行义项的建立和分合工作罢了。这样做，显然是对于《说文解字》的一种发展，这种发展的意义在于使释义更趋细致和实用。

由此可以看出，《玉篇》这部书的性质与《说文解字》是不同的。它是一部有着很高训诂价值的文字书。这样的字书，在顾野王之前不曾有过，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创新。它集“字典”与“词典”的特点于一身——既对《说文》有所继承，又兼有《尔雅》一类词书的性质。当它出现的时候，《尔雅》一书仅有郭注，《广雅》则还没有注疏，一般学者读书查找词义时，能有这样一部既解释词义又可以当索引用的字书，无疑是会感到很方便的。所以，它流行了200多年，还被日本僧人抄写回去，成为他们国家最早的一部字书。长时间以来，日本人不但把《玉篇》当成字典的代名词，而且后来又出《倭玉篇》、《玉篇钞》等一批字书。《玉篇》一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有过大贡献的。

《玉篇》之所以同《说文解字》有这种性质上的不同，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找到原因：

一方面，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跟着发生种种变化。许慎的时代，许多先秦古籍已经非有经师讲解不可了，所以才有“诸生”跑出来“竞说字解经谊”（《说文解字叙》）。过了540多年，语言又有了很大发展变化，文字也变易孳乳得越来越多，这种客观情况，要求顾野王在编写字书时不得不冲破《说文解字》的体例，增加新的内容，以适应时代需要。

另一方面，顾野王的撰述意图也不同于许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慎。

许慎是“五经无双”的古文经学派大师，他在书叙中明确指出，著《说文解字》的目的是通过“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来为“王政”这个政治理想服务。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立”才能“道生”，所以他研究文字务求其“源”以固其“本”。收哪些字，不收哪些字，他是很严格的，由此，他发明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分部相从之法来统率成千上万的汉字。

顾野王生在六朝，虽然他的父亲“以儒术知名”，他本人也是信奉儒家学说的（见《陈书》卷三十及《南史》卷六十九本传），但那个时代毕竟已与东汉有了很大的不同。经历了魏晋时期思想学术界的动荡冲击，又加上佛学的输入，读书人的思想情况和要求有了发展变化。况且顾氏在编写字书时似乎也并没有要跟什么学派的什么主张论争之意，所以他很自然地采用了当时流行已久的楷书。他把《说文解字》同《苍》《雅》字书之类都只当成自己收字作注时的参考，凡是当时能见到的字，不论篆隶古籀，兼容并包地全都搜集来编在一起。

黎庶昌在《书原本玉篇后》那篇跋语中说：“《说文》讨篆籀之原，《玉篇》疏隶变之流。”从文字形体方面看，他的话是对的。我们由此也可以体会出二书编撰目的与性质特点上的不同。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后出的字书必然要在前代字书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发展。清代学者在评价《玉篇》时往往较多地指摘它不完全遵从《说文解字》的一面，而忽视它对于《说文解字》有所发展的一面。这里固然有《玉篇》（特别是广益本《玉篇》）本身存在的错误和缺点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这些学者在理解问题上存在着局限性。今天，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观点。对《玉篇》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责任编辑：寇养厚）

大型资料工具书《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即将出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将推出的大型资料工具书《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为适应当前学术界、文化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迫切需要，前后花费八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在国内尚属首创。该书将活动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内，不论政界、军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各类人物，凡是有公开发表传记资料的，均兼收并录，以供读者检索。全书收录人物达18000余人。中文传记资料80000余条。资料来源于我国出版的报刊(含台湾、香港)1200余种，以及中文专著、论文集、年鉴、百科全书、各地文史资料选辑等2500余种。本书检索方便，所收人物，按姓名的笔画为序排列；各传主的传记资料，则按专著、报刊、论文集分类编排。书末附有收录报刊、论文集一览表和其它有关参考书目。

本书所收人物之多、涉及面之广、资料之丰富，为目前国内外同类工具书中所少见。该书是进行中国近现代人物传记研究的必备工具书。

（德　华）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